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1.004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生成的中介：法兰克福批判理论

张 兵，何舒欣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亲缘关系，而是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中间环节。分析福克斯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福克斯在对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进行重构的基础上，以“数字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如何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行微观分析—如何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逻辑理路，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劳动思想，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从法兰克福的“超距”偏移中又逐渐向马克思靠拢。

关键词：福克斯；数字劳动；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异化劳动；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4)01-0024-09

The Intermediary in the Generation of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ZHANG Bing, HE Shuxin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Instead of a direct kinship between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Marx's related theories, there is an intermediate link between the two, i.e.,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s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Western Marxism, 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uchs and Critical Theory can reveal a more accurate connotation of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its role and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t theories.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Frankfurt's Critical Theory, Fuchs has established his own thought on digital labour in the logical way of "whether digital labour is alienated labour—how to analyse the alienated state of digital labour microscopically—how to overcome the alienated state of digital labour". His digital labour has gradually brought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arxism closer to Marx from Frankfurt.

Keywords: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r;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lienated labor; Western Marxism

收稿日期：2023-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财产权批判谱系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研究”（21CZX007）；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再研究”（2020A024）

作者简介：张 兵，男，河南确山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中西哲学比较；何舒欣，女，湖南衡阳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与中西哲学比较。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现任帕德伯恩大学讲座教授, 是研究数字劳动思想的著名学者。在西方马克思劳动思想与劳动解放论日益式微的理论环境中, 福克斯坚持从劳动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 在众多西方数字劳动研究者中独树一帜。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可用于批判地理解数字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劳动”^[1]。正是福克斯对马克思劳动立场的坚持点燃了国内学界的研究热情。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是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如是否违背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2]、是否坚持了劳动价值论^[3]等问题, 而往往忽略了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批判理论渊源。实际上, 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不是直接的亲缘关系, 而是经历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 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为中间环节。借助对福克斯与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关系分析, 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角色与地位。

一、批判理论视阈中的劳动观与劳动解放观

在福克斯本人看来, 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理论的一般表述”^[4], 换言之, 批判理论被福克斯本人视作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理论, 是数字劳动异化观构建的思想基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简称批判理论)有许多关于劳动和社会病理解决方案的论述, 其中, 第一代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第二代哈贝马斯的生产交往二元论、第三代霍耐特基于承认理论的物化观成为福克斯的关注重点。

(一) 马尔库塞的劳动本体论: 游戏与劳动的二分

马尔库塞认为, 劳动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范畴, 是“人的此在的基本的发生性, 且这种发生持续贯穿于人的整个存在”^[5]。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进一步明确了劳动的本体论规定: 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运动、是生命活动本身”^[6]。

为了论证劳动本体论, 马尔库塞将“游戏”与“劳动”作了对比, 在二者相异的基础上由游戏的特性进一步论证劳动的持续性(duration)、经

常性(permanence)、负担性(burdensome)三大特性, 最终得出劳动是更本质的概念, 而游戏是劳动的派生概念。

第一, 游戏是非对象性的、“自由”的, 而劳动是对象性的、有负担性的。游戏的非对象性, 不是指人在游戏中不与对象打交道, 而是指人在游戏中可以随心所欲。“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待对象, 他变得自由由于对象, 他根本不理睬对象”^{[7]216}, 在游戏中他是“同自己在一起而不是同对象在一起, 他向对象发泄他的自由”^{[7]217}。这样看来, 游戏似乎是一种在自身、通过自身就完成的发生, 自因自果, 是一种确定的自我发生, 是一种不用对象就达到的自由。而劳动是对象性、负担性的: “在劳动中, 人总是离开他的自我存在而表明一个他者, 人在劳动中总是处于他者并为着他者。”^{[7]221} 劳动总是要遵循与自身存在相异的“物”的规律, 具有对象性、负担性。

第二, 游戏具有间断性、个别性, 而劳动具有持续性。游戏是在“持续地、经常地统治着人的此在的和其他的做‘之间’的时间中发生”^{[7]217}。它总是间断地发生, 并总是有时间性的。在人的整个此在中根本不具有持续性和经常性。而劳动的持续性是指劳动的历史延续, 对任何一种劳动而言, 要想实现任务, 不能只凭此在本身的个别劳动, 而是要依赖他在, 依赖全部人类劳动。同时, 人的存在总是多于他当下的此在。这种“多”的可能性要实现出来就要靠此在持续不断地劳动。

第三, 游戏具有依赖性, 而劳动具有经常性。游戏本质上是不独立的、依赖于他者的现象。“游戏本身证明它依赖于其他的做……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集中、紧张等等而进行的自我消遣、自我放松和自我调整”^{[7]218}, 而劳动具有“经常性”, 或称一般性。劳动所带来的作用或意义比具体单个劳动行为本身更长远, 超越了这个特定的劳动过程, 具有了一般性的价值。

总之, 马尔库塞认为游戏和劳动是不同的, 他更加看重劳动。他将劳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 而游戏只是劳动的派生物, 是为了劳动而作的休整。游戏不具有对象化的性质, “人永远只能通过他自身的他在才能达到自身的存在, 只有在自身的‘外化’和‘异化’过程中才能获得自身”^{[8]124}。人要存在就必须劳动, 不劳动就不可能存在, 马

尔库塞坚持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故而坚持劳动解放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将劳动与游戏紧紧地绑在一起,而游戏与劳动、爱欲与文明本该是对立的,力图永久实现爱欲是人类的本性。在此基点上,他将劳动解放视为爱欲(游戏)解放的手段,主张用爱欲重塑人类社会,实现劳动爱欲化,消除劳动异化带来的压迫,使个人在劳动中获得快乐。

(二)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前提:劳动与交往的二元对立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区分了劳动和交往并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而区分了生活世界和系统,提出社会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最终提供了以交往重塑生活世界规范力的解决方案,摒弃了劳动解放论。

第一,劳动是工具理性的作用场域,而交往是交往理性的作用场域。工具理性是指在实现预定目标时,通过运用工具、技术和合理化手段来追求效率和实用性的思维方式。它强调目的性,着重于使用一切可行手段来达到最大效益。在工具理性的逻辑下,行动者会通过理性规划、组织和执行来实现预期的目标。劳动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工具和技术来实现效率和生产力的提升,故而是工具理性的作用场域。相比之下,交往理性强调的是彼此的理解、共识和合作,强调平等和自主性。交往是人们彼此之间合作建立社会联系和共识的过程,人们通过对话、讨论和协商来寻找共同利益和公正的解决方案,关注集体的需求和价值,故而是交往理性的作用场域。

第二,劳动以货币和权力为中介,而交往以语言为中介。在劳动中,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和价值衡量单位使劳动者能够与其他人交换劳动成果并获取物质资源。权力关系则反映劳动者在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暴露出劳资关系的不平等状态,对劳动者的工作条件、福利和地位产生着深远影响。而交往作为一种建立社会联系和共同意义的过程,主要通过语言的中介来实现。人们在交往中通过对话、讨论和辩论,表达自己的观点,理解他人的立场,推动意见交流和协商达成共识。

第三,劳动是为了达成主体目的的主体性概念,而交往是以达成双方共识为目的的主体间性概念。所谓主体性概念是以“主体-客体”为结

构的哲学范式,以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影响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哈贝马斯的劳动概念仅指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进行征服、支配与改造,故而是聚焦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体性概念。而主体间性概念是以“主体-主体”为结构的哲学范式,在交往中,要想真正达成共识,就不能把交往的对象看作“客体”和“工具”,而是要把对方看作和我一样的人来对待,把对方也当作主体来对待。故而交往是聚焦人与人关系的主体间性概念。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将劳动与交往对立,对劳动保持一种贬斥的态度,而将交往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与劳动交往二元对立相应的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二元对立,“生活世界是由文化传统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模式的宝库”^{[8][189]},而系统是以钱权为标准的协调人际关系的媒介。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摆脱这种状况,通过交往重新建立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形成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三) 霍耐特融摄劳动解放论的始点:物化是对承认的遗忘

霍耐特师承哈贝马斯,他的承认理论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都注重对主体间性的建构,但他并非如哈贝马斯那样完全摒弃劳动解放论,而是以承认理论来融摄劳动解放论。这一融摄过程的起点是用承认理论对卢卡奇物化概念进行改写,从而对其进行扩展,使其社会批判性质不仅局限于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和“主-客体”结构,成为涵盖三个社会子领域,统筹主体、主体-客体、主体-主体三重关系的概念。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是从《资本论》里对商品拜物教的描述中提取出来的概念,指的是“人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动成为某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凭借某种与人相异化的自发活动而支配人的东西”^[9]。卢卡奇用物化概念归结了社会化主体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病态现象,并认为这种病态将扩展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霍耐特认为,卢卡奇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基于一种同一性的主-客体思维逻辑去理解物化概念,经济领域中商品逻辑的物化现象不能自然地扩展至整个社会领域。同时,卢卡奇对“工

具化”与“物化”的概念区分不清晰,这将导致对承认关系的蒙蔽。“我不希望物化一词,像目前经常发生的那样,只用于指对他人进行‘工具化’的某种态度或行为。”^[10]基于此,霍耐特用承认理论对物化概念进行了主体间性逻辑的重构。

首先,霍耐特确定了承认在社会形成和认知形成中的先在性。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将黑格尔早期著作中作为人类社会化的自然基础的主体间共存理解为“承认”关系,认为承认作为社会道德原则,具有逻辑先在性,并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承认的先在性。“在人类社会行为中皆存在着一种承认优位,承认优先于认识,对人之共感参与优先于中立地认识他人。”^{[11]81}“默想以及疏离成为卢卡奇用以解释物化如何进而延伸至社会行动层面最关键的两个概念”^{[11]22},他认为卢卡奇是以一种漠然旁观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对于不是经济活动领域内的社会现象,仍以看待物的方式去看待之,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霍耐特提出了承认的三种形式及其在三个社会子领域中的存在方式。他认为在黑格尔后期的意识哲学中,为承认而斗争的作用让位于精神,整个伦理领域被黑格尔视为精神自我反思的客观形式,承认在黑格尔处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精神自我反思的关系,变成了主体的自我反思关系。在后形而上学(费尔巴哈、马克思等)打破了唯心主义前提的条件下,承认理论的转型便迫在眉睫。在此情况下,霍耐特以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根据,将承认塑造为一个主体间性的人格概念。承认的三种形式是:爱、法律和团结;与承认的三种形式相对应,也存在着三种蔑视形式,每一种蔑视都是激发社会冲突的行为动机。这样就能够从承认自身的固有形式去认识除了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子领域。

最后,霍耐特基于承认理论,提出物化是对承认的遗忘。他认为卢卡奇物化观中对社会病理的客观化态度“以为自己完全独立于所有非认识的前提条件”^{[11]88},而真正的物化“所指的是一种过程,过程中我们遗忘了,人之认识他人并拥有关乎他人的知识,曾经如何受惠于先在的承认与共感”^{[11]88}。进而,霍耐特分析了物化的三种形式:人与自身关系的物化,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人与

客体关系的物化。这样承认理论的物化观就涵盖了主体、主体间、主客体三重维度。霍耐特认为,卢卡奇聚焦于无产阶级失去生产资料导致的物化状态,进而坚持劳动解放论,这只是一种狭义版本的为承认而斗争,它缩小了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范围,缩小了社会病症所覆盖的领域,“为承认而斗争”是更大范围内伦理意义上的“为名誉而战”,而不只是经济领域的“为生存而战”。

二、福克斯对批判理论劳动观的继承与重构

福克斯并未直接采用批判理论的劳动观,而是根据数字劳动的当代特征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改造,以游戏劳动概念消解了马尔库塞游戏与劳动的二分并使游戏劳动概念成了一个批判性的理论术语。他还针对哈贝马斯劳动与交往的二元对立提出了“交往劳动”概念,同时借助卢卡奇的劳动目的论设定阐述了“合作生产原则”,从而为构建数字劳动思想提供理论抓手。

(一) 游戏-劳动界限的消解和游戏劳动概念的提出

福克斯运用马尔库塞游戏劳动二分的理论分析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他发现,在数字劳动中,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之间、劳动和游戏之间的界限消解,游戏和劳动走向同一。这种看似实现了劳动爱欲化的数字劳动,仍是带有剥削性质的异化劳动。

一方面,劳动逐渐有了游戏的特性,变得“自由化”。福克斯引用了赫斯蒙德和贝克对有酬创意行业的工作的社会调研结果作为例证,说明了有酬创意行业的工作者的矛盾心理,“这些工作是不稳定的,但却因为乐趣、人脉、声誉和创造力以及它可能涉及的自决权而受到珍视”^{[12]118}。这说明,本属于劳动的持续性、负担性降低了,而具有游戏的自由和乐趣。福克斯又基于社会调查报告对在数字社交媒体平台搭建起到核心作用的算法程序员、架构师等“谷歌的硅谷劳动贵族”的采访,根据算法程序员劳动时间上的随意性、劳动过程的创造性和高薪资等特点,证实数字社交媒体中,劳动具有游戏的特点。

另一方面,游戏逐渐有了劳动的特性,变得有“负担性”,从“为我”变成“为他”。福克斯

引用企业社交媒体对网民的剥削作为例证。网民在使用平台的“游戏”过程中,本是出于自身的目的而上网,却同时正在为平台无偿生产商品化可出售的数据,这意味着“以享乐、娱乐、快乐为目的的私人使用互联网——爱神的方面已经归入资本,并已成为劳动剥削的一部分”^{[12][116]}。互联网企业通过剥削用户的享乐劳动积累利润。所谓的参与式管理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在平台上发表的一切内容都会被转化为商品化数据,使平台拥有者即资本家盈利。

在论述游戏与劳动同一化趋向的基础上,福克斯提出了“游戏劳动”的概念,认为其是数字劳动中的一种,并将其作为批判性概念使用。“在脸书上,游戏和劳动融合为资本积累剥削的游戏劳动(play labour)。”^{[12][116]}“脸书代表了时间的全部商品化和剥削利用——人类的时间都趋向于成为资本剥削产生剩余价值的时间。”^{[12][116]}其次,福克斯提出了“游戏劳动”是一种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客观的异化劳动是作为创造性的、自由的和自治的活动取悦于工人而存在的,工人应该享受和热爱他们客观的异化。福克斯认为“游戏劳动”虽是游戏和劳动同一的产物,却始终是一种有待克服的异化劳动。通过对马尔库塞劳动观的重构,福克斯明确了“游戏劳动”的异化性质和批判性内涵。

(二) 劳动-交往的辩证统一与交往劳动概念的提出

“你们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支持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当然,任何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应该与哈贝马斯有所联系,但哈贝马斯已经离马克思太远了。”^[13]福克斯指出了哈贝马斯劳动-交往二元论的局限性:第一,哈贝马斯只把语言交往看作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语言,忽视了其他语言形式,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货币作为“商品的语言”。第二,工具性行为和交往行为都具有目的性,不能截然分开。第三,语言交往并不是一个纯洁的领域。意识形态就是高度工具化的语言和交往形式,其为统治和剥削服务,便成了统治的工具。第四,劳动不仅是工具行为,也有助于形成有益于全社会的普遍的善。哈贝马斯将劳动概念限制为策略性的工具行为,就否定了在社会公益服务、生产公共产品和从事志愿者服务

等劳动中也产生社会使用价值的事实。在对哈贝马斯二元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福克斯提出劳动与交往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劳动具有交往的性质。劳动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合作以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的过程,而交往是在劳动中协调配合的过程。全部劳动都处于社会关系中,因此需要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福克斯借助雷蒙德威廉斯的交往分工理论和马克思所强调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4],指出交往中产生的目的性、创造性认识也是劳动的关键方面。

另一方面,交往也具有劳动的性质。福克斯采用了罗西·兰迪和亨特关于交往的劳动特性的观点:“交往是人类的劳动,因为它在共享词汇、句子、讨论、文本、研讨和全部语言的形式中生产社会的意义。”^{[12][178]}强调在交往过程中,社会化的人是有意义的信息的共同生产者,并将其与马克思人是自身观念的生产者、现实的人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观点结合起来。

劳动和交往并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在统一中有其内在的差别。福克斯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交往不仅是单纯劳动,而且是理解的基础。通过交往,人类学会理解世界,了解个人与他人交流的信息和动机。我们不应像哈贝马斯一样,认为理解就是伦理道德上的一致,只有对现实社会的解释才能使交往具有意义。交往是劳动的特殊形式,但是在对社会的意义以及世界的理解方面,交往比劳动更为丰富。劳动不纯粹是个人性的,而是在群体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在其特性上是交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劳动这个概念又内在具有交往的意蕴,劳动是由交往组织起来的一种生产性的社会活动。

总之,福克斯认为劳动和交往是对立统一的两方面。一方面,人类的生产是社会的,因此它是一种交往性的关系(劳动的交往性)。另一方面,交往是交往自身的生产,因此是一种劳动的特殊形式(交往的劳动性)。劳动就是人类活动的生产方面,而交往则是人类活动的社会关系方面。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给定的存在,也需要生产和再生产。福克斯据此提出了交往劳动的概念。

交往劳动是创造信息和信息技术的社会生产过程。信息是通过信息技术(如计算机)生产、传播的,故物质信息技术的生产也是交往劳动的一部分。物质劳动的一个子集就是创造信息技术的物质性劳动;信息劳动则是脑力交往,它生产社会性的意义。物质劳动和信息劳动是交往劳动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三) 借助卢卡奇的目的论设定确立“合作生产原则”

福克斯肯定了霍耐特承认范式的物化观所具有的理论优点:第一,霍耐特的物化观划分了主体、主体间、主客体三重维度,相较只看到主体或主客体维度是一个进步。第二,将承认作为社会存在的本质,在道德理论范围内重启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道德本质社会化的重要性,超越了后现代的道德相对主义。

同时福克斯也指出了霍耐特的局限:承认理论作为道德一元论,在经济生产环节有所缺失,使承认和道德成为社会基础的同时,忽视了生产合作的重要性,回避对经济、劳动、剥削的直接讨论,他将社会按照承认的形式和内在结构划分为三个子领域,导致面对“社会三个子领域之间,即家庭、法律和经济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时,只能作出一个简化的回答,即名为承认的道德原则。然而,人要活在世界上,不仅要彼此承认,还需要合作生产,人为了生活就需要吃喝住穿。没有合作生产,没有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一致的劳动,人就一天也无法生存。

为弥补霍耐特理论中生产环节的缺失以及社会子领域统一简单化的缺陷,福克斯将卢卡奇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关于劳动的目的论假定进行了重新挖掘和阐述,他认为二者的理论是可以互补的。卢卡奇的劳动目的论将劳动作为社会存在中最首要和基本的范畴,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起点。“任何社会现象都——直接或间接地,也许非常广泛中介地——以劳动及其一切本体论结果为前提。”^{[15]117}与此同时,卢卡奇从马克思蜜蜂造蜂房的著名论述中总结出:“除了劳动(人类实践)之外,马克思否认有任何目的论的实存。”^{[15]116}卢卡奇认为,劳动作为物质现实性的实在要素的目的论设定是唯一可证明的本体论。如果在劳动开始之前,没有一个目的

论假定来规定具体的劳动过程该干什么,那么劳动就不可能存在。而在自然中只有因果,没有目的。只有通过劳动的目的论设定,人才从自然界的有机生命中独立出来,把自己变成社会存在。目的论设定是社会存在的共同特征,是劳动和交往的共同特征,即可以实现经济和文化的统一。

福克斯将承认理论和劳动的目的论结合起来,认为社会性生产合作才是社会的本质。人为了活着,不仅要承认彼此,还要在合作中一起生产社会世界,没有基本的合作,个人和社会就无法生存,没有合作只有竞争的团体迟早会毁于冲突和暴力。将合作生产看作社会的本质似乎与以承认为社会的本质相冲突,然而,彼此的道德承认正是合作生产世界的形式之一。承认就是合作生产世界的文化过程,或者说文化生活中的合作生产就是承认,是人们在彼此承认中达到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同时,人类也需要在经济生活中共同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在政治生活中集体协商、集体决策。合作生产原则把社会三个子领域统一起来,如果社会系统整体上呈现出合作原则而非统治的特征,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与它的本质相一致的,是与它本身的道德基础相一致的。而资本主义是不符合合作原则的非伦理化存在。

三、福克斯对数字时代异化劳动的确证、分析和消解

福克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和重构的基础上开始搭建自己的数字劳动异化思想,打通了“数字劳动是否是异化劳动—如何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进行细化分析—如何克服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逻辑理路。

(一) 基于游戏劳动概念对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确证

虽然游戏与劳动的统一产生的游戏劳动仍处于异化状态,但这没有动摇福克斯对马尔库塞理论的坚持,没有使他转向悲观。他基于游戏与劳动同一化趋向对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进行了重构和运用,分析了数字劳动中的快乐实现,进而确证了数字劳动的异化状态。

他仍然坚持马尔库塞关于爱欲是人的本质、力图永久实现爱欲的快乐原则是人的本性的观点,从而将人类欲望的本质规定为:快乐的直接满足、

游戏、获得性、无压抑状态,并以此为最初状态考察爱欲原则在不同社会模式中的异化程度。在资源稀缺社会中的现实原则是对快乐进行延迟满足、完全克制和压抑爱欲、不得不坚持生产性的苦役。在传统资本主义中的压抑现实原则同样是对快乐进行延迟满足,但快乐已比资源稀缺社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它存在于人们的闲暇时间内。人们在闲暇时间内具有感受性、在工作时间内具有生产性。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对快乐进行必要压抑,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对快乐进行额外压抑。这两种社会模式中的现实原则是福克斯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述内容的直接运用。

福克斯创造性的部分在于对社交媒体时代资本主义的压抑现实原则的描述。在社交媒体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中,快乐不再处于延迟满足的状态,通过使用数字社交平台,快乐可以得到直接的在线满足。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限不再,人的一切时间都是生产性的,都可以被剥削、商品化。游戏等同于苦役,因为其看似快乐,但仍服从于压抑。这是因为游戏劳动者对社交平台本身没有所有权。那么破除游戏劳动异化的方法便是要实现对社会平台的共同占有。福克斯创建了公共性的社交网站,身体力行他主张的对异化解放的解决方案,并且通过参加公共活动、著书立说呼吁更多人参与到这一行动中来。

(二) 基于物化观对数字劳动异化状态的九重维度分析

在确定合作原则是社会的本质之后,福克斯论述了物化和异化的区别,认为物化是统治的过程,而异化是物化的结果,是合作原则的丧失。福克斯以三个社会子领域(经济、政治、文化)为纵轴,以主体与主体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对象之间三个维度为横轴,创设了异化分析的九宫格表格,微观分析异化在社会三个子领域中的表现形式。

经济生活中的异化在主体与自身的维度表现为主体对工作的不满,在主体间的维度表现为缺乏对劳动力的控制从而产生剥削,在主体与客体间的维度表现为主体缺乏对生产资料和控制和财产的丧失。对这种异化的斗争方式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政治生活中的异化在主体与自身的维度表现为主体对政治的不满,

在主体间的维度表现为缺乏对政治权利的控制,在主体与客体间的维度表现为缺乏对决策的控制,权利集中化。对这种异化的斗争方式是社会运动、抗议、组织政党进行政治革命。文化生活中的异化在主体与自身的维度表现为主体对自身的不满,在主体间的维度表现为对有影响的沟通的控制而感到羞辱,在主体与客体间的维度表现为缺乏对公共观念、意义和价值的控制,信息集中化。对这种异化的斗争方式是为承认而斗争。

福克斯将异化分析的九宫格表格运用于分析脸书上的数字劳动异化,然而,数字劳动异化却存在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对立,从而解释了社交平台公司的矛盾特性。从客观的角度看,第一,数字劳动体现出经济生活的异化,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表现为用户对平台没有所有权,平台无偿占有用户所生产的数据,在主体与客体间的维度上表现为用户对个人数据的使用缺乏控制,自己创造的数据不归自己所有。然而,在主体与自身的维度上,对于数字劳动体现的经济生活异化,用户却有异化和非异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感受。第二,数字劳动体现出政治生活的异化,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表现为平台对市民通信的政治控制和监视,如斯诺登所披露的,网络社交平台大量线上交流信息处于监控之下。在主体与客体间的维度上表现为市民对政治机构如何规范互联网、建立监控产业综合体缺乏控制。而对于政治生活的异化,在主体与自身的维度上看,异化的感受认为脸书是威胁自由、从事监视的产业综合体。而非异化的感受认为为了更安全,我们不得不放弃隐私,因此我不在意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监控。第三,数字劳动体现出文化生活的异化,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上体现为普通用户相对于名人、公司和权力机构用户拥有极不平等的曝光度,在主体与客体的维度上体现为在公众舆论引导、集中网络注意力结构和在线曝光度上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而从主体与自身的维度上看,异化的感受认为:发脸书是无意识的唠叨、自我暗示和炫耀,非异化的感受认为脸书是一个与他人社交的好方式。在数字劳动中,拥有非异化感受的人占大多数,大家并没有感觉到被剥削、监控和排斥。

通过对数字劳动异化的九维分析,福克斯进一步提出了数字拜物教(digital fetishism)的概念。“数

字拜物教意味着数字媒体所带来的网络社会的即时性掩盖了更加抽象的数字化的剥削、控制、监视和排斥的现实。”^{[12][155]} 用户难以察觉数字劳动异化, 而数字拜物教和数字劳动异化只能通过社会斗争来克服, 这些斗争的目的就是占有互联网、有选择性地重建和使用公共性的数字媒体, 使用户真正获得相互尊重的生活。

(三) 基于合作理性超越交往理性的数字异化劳动消除方案

福克斯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批判以及对劳动交往对立统一关系的阐述, 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否定了, 并代之以合作理性方案。

首先, 福克斯否定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第一是否定哈贝马斯关于“合理性”的理解。哈贝马斯把合理性行为理解为“有充分的理由或根据”的行为。福克斯指出, 术语“合理性”的拉丁语词根是“ratio”, 这只是表明我们的行动是建立在推理和思想上的, 即当人类行动时, 是带有一定目标的。这种行为的结果并不总是道德上的善, 而是目的达成的合理性, 反映出人与动物的不同。第二是说明交往不是固有的善, 而是可以服务于两种不同的目的。杀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和组织收集衣物捐给流浪汉的利他主义者, 都要相互之间进行交往以达到他们的目标。这两种交往都是理性的(即都是带有一定目标, 建立在思考和推理上的), 但具有本质的区别。

福克斯将这两种形式的交往定义为工具交往和合作交往, 划分依据为是否为统治服务。“所谓的统治的社会关系, 是指其中一个社会集团控制和使用资源, 通过掌握物质性的、结构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制, 一个群体以牺牲另一个群体的代价攫取利益的社会关系。统治可以导致通过劳动剥削获得经济特权, 通过控制获得政治特权, 通过意识形态统治获得文化特权。”^{[12][181]} 统治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和工具交往基础上的: 统治的社会关系是指以工具性目的组织起来的剥削和控制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一个集团将另一个集团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工具交往是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交往。而合作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治逻辑相反, 它不以创造、再生产或者加深统治为目的, 它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超越统治的社会关系, 创造一种环境, 让每个人都获得福利, 过上

幸福生活。合作交往是建立在合作理性基础上的交往。

福克斯将阶级社会的历史理解为工具理性和合作理性冲突的历史。统治阶级的目的是寻找更新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利益工具化, 统治阶级也力图使统治思想成为必要的、必然的和无可替代的。被统治阶级有可能抵制工具化交往, 组织对旧有统治秩序的斗争, 通过挑战工具理性建立新的社会合作体系, 共同传播被统治阶级的抗争和对建立合作社会的渴望与需求。消除异化就要运用合作理性而非交往工具理性, 建立在合作理性基础之上的合作交往就是要形成民主的媒介组织并以此来构成交往体系。合作理性能够使人们摆脱交往工具理性而参与到共同讨论、共同创造、共同分享信息成果之中。

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是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生成的中介, 福克斯消解了马尔库塞游戏与劳动的二分论, 创设了“游戏劳动”概念, 并使之成为批判性概念; 批判了哈贝马斯劳动与交往的二元对立, 创设了“交往劳动”概念; 借助卢卡奇的劳动目的论设定对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进行重构, 创设了“合作生产原则”, 主张利用人们在合作中的合作理性, 形成民主的媒介组织并以此来构成交往体系。他试图以合作理性来统摄交往和生产, 并用之联系三个社会子领域, 同时摒弃“统治”给交往、生产带来的恶性影响。然而, 他却在否认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同时, 又以“合作理性”的形式掉入了理性主义的牢笼之中, 未见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

由此可知, 当我们在对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进行研究时, 特别是在考察其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之间的亲缘关系时, 应当同时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嬗变过程,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是二者关系考察中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从而更精准地把握福克斯数字劳动思想的丰富内涵, 更客观地评析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福克斯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思想, 并以之为核心对批判理论进行重构, 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超距”偏移中又逐渐向马克思靠拢,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批判力量。而美中不足的是, 数字劳

动对社会发展亦有肯定的、非批判性的一面,如促进生产力发展、丰富社会生活等,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思想中对肯定方面的阐述较少,这一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 [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11.
- [2] 陆 茸. 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剥削: 对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用户“数字劳动”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J]. 经济纵横, 2019(5): 11-17.
- [3] 胡 莹. 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新课题 [J]. 经济纵横, 2021(11): 28-35.
- [4] FUCHS C.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New Readings of Lukács, Adorno, Marcuse, Honneth and Habermas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M]. Westminste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6: 6.
- [5] MARCUSE H, WOLIN R, ABROMEIT J. Heideggerian Marxism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125.
- [6]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 上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305.
- [7] 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 [M]. 李小兵, 译.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9.
- [8]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ume 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189.
- [9] 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 [M]. 王伟光, 张 峰,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86.
- [10] A 霍耐特. 对物化、认知、承认的几点误解 [J]. 胡云峰, 译. 世界哲学, 2012(5): 115.
- [11] 阿克塞尔·霍耐特. 物化: 承认理论探析 [M]. 罗名珍,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2]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交往批判理论: 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 [M]. 王锦刚,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 [13] 常 江, 史凯迪.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互联网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数字劳动 [J]. 新闻界, 2019(4): 6.
-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8.
- [15] LUKÁCS G.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2. Halbband) [M]. Darmstadt und Neuwied: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86.

责任编辑: 陈 璐